

▶ 早期中国文献研究方法之反思*

[美] 柯马丁 (Martin Kern)**

一、引言：两个根本问题

自 1973 年马王堆的发现开始，有关古代中国手抄文献的研究已成为汉学研究旗下国际性的显学。受到源源不断的新发现的推波助澜，这个领域已经跨越了历史、文学、宗教、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特别是古文字学和语音学）、考古、艺术史和哲学。如今，这些学科领域内的不少专家都在研究中国手抄文献；不论就广度还是深度而言，不论在中国、日本、欧洲还是北美，他们的努力都早已超越了敦煌学。中国学界在早期手抄文献领域起的带头作用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提供出土报告，整理和发表新出土的文献，深入细致的古文字学工作，以及把手抄本与传世文献及当时思想潮流之大局相联系起来。由于这些工作被全世界的学者广泛阅读、应用，我们似乎正身处一个国际色彩鲜明的学术领域从事研究工作。

* 本文原发表于《国学学刊》，译者杨治宜。修订本补译者罗进昌。

** 作者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学系教授。

但是，古代中国的研究的国际性有着诸种限制，直接影响此研究领域的方法论。我们必须确认两个根本问题：单语主义（monolingualism）与单一文化主义（monoculturalism）。在中国境外的学术圈工作的学者，比较容易确认这两个问题。这不表示，对于中国境内的学者，这两个问题较不要紧。其实正好相反。^①

单语主义的问题相当复杂，不单是关乎学术上多种语言的运用。中国以外有部分学者只能掌握自己的母语，但他们不是主流多数，也不被视为学界的领头羊。相反，第一流的西方及日本学者，既致力于研究中国学界的，同时顾及一至两种其他语言的学界的研究成果。不幸的是，目前中国圈子里还未见得有这种情况，因为有太多学者不能掌握任何外语。“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四十多年了，断不能以之为理由来解释这种状况。更甚者，撇除纯粹的语言问题，他们似乎不太愿意理会外国学界，即使相关研究成果已被译成中文。当有中译存在，被广泛阅读的外国学术著作，多数是那些采用中国学术圈子的观念与术语来展开讨论的作品；即是，这些作品探讨的话题，与中国学者所关注的问题相近（大抵围绕古文字学与思想史问题），然后使用中国学者同样的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没有依循这些规律的外国学者，其著作通常不受欢迎，或者很快便被弃若敝履。

增加译者数量不是改变这种状况的良方。广为人知的是，大多数外国著作的中译本充斥着严重的错误。在使用不同方法与论述概念的著作中，误译尤其明显。译者通常并不完全明白原文，或者无法准确使用中文表达当中的细微分别。当然，互不相关的语言会构筑不同的思想世界，世界不同的表达结构体现不同的思维方式。即使本文译成中文之后，就已经与原本我以英语写成的那篇文章不尽相同。这是相当重大的区别。

^① 更多关于中国研究的单语主义与单一文化主义的见解，可参见《认同与方法：什么是国际汉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10（2014）：252—262 页。

因此，当指导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撰写论文时，我会要求学生涉猎所有与其课题相关的学术作品，并以原文掌握它们。这至少包括中文、日语、英语、德语及法语的著作。我不容许任何学生因为不懂某种语言，而忽略与其课题相关的重要著作。但是，为什么就算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却依然容许这种事情的出现？

人文学者必须致力于认真学习外语，以期达到一定的晓畅程度，足以参与严谨的学术讨论。我不能是个只操单一语言的人，然后要求其他人迁就，以我懂得的语言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学术观点。跨语言社群的学术交流，彼此应付出相同努力来表达自己的、理解对方。当然，人文学科的单语主义并非中国人专属的现象。大抵上，每当学者研究自己所属的文化传统，它就会出现。例如很多美国文学与历史的学者，就只会阅读英语。但是，人文学科的单语主义是一种选择，它反映出一种不屑外国学术成果的心理态度。从定义上说，不学习外语的学者宣示了他们有权忽略所有外国的学术成果。如果要探讨有关中国文献研究的方法论议题，我不能想到其他更根本的问题。

早期中国文献研究所呈现的单语主义，直接导致我们的研究领域分裂成不同且互不兼容的学术群体，大家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范围。只要学者们试图从某群体走向另一群体，便会立即出现以下情形：当一个由中国而来的年轻学者，申请成为北美某所大学的访问学人（这种事情每天发生），却昧于北美的研究成果，则依惯例他多数会被拒诸门外。作为《通报》——于 1890 年创办的领导西方汉学研究的期刊——编辑之一，每见来稿没有展示出对中日及西方学术成果有所关注，我可以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拒绝刊登。不阅读及使用中日同人的著作的西方学者，他们的文章不会被刊登于《通报》，反之亦然。不幸地，通常我们拒纳一些内容充实、由中国学者所撰的文稿，只因为他们未能显示对境外研究有所关注。

某种程度上说，单一文化主义问题与单语主义相关：在当代中国学

术界，几乎没有学者采取比较研究的进路，将古代中国置于广义的古代世界来进行考察。思考这种现象时，我想起了牛津的德国籍宗教教授缪勒（Max Müller）。他有名言说道：“知道一种‘宗教’的人，什么也不知道。”要引人入胜地诠释中国或其他古代遗产，不能单单就其自身或囿于个别业已形成百年的学术传统之内来进行。相反，如果我们重视古代文献所承载的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学问，则跨古代文明的文化比较所得的洞见，具有更多有助我们研究的资源。

为什么比较研究如此重要？第一，透过比较，我们方始明白什么是中国独有、什么是不同文明所共享的。我们才会认识到，古代文明做出他们自己的文化选择，并为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下定义。这些事情不是自然所予的。一个古代文明拥有或不拥有伟大事迹，这是寻常的吗？我们知道古希腊有约五百位本土史学家的名字，这是寻常的吗？我们又知道古代中国保留史料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无名氏，这是寻常的吗？在不同文明里，诗歌的“创作”真的都是相同的活动吗？若然，为什么某个古文明会点名歌颂诗人，而另外的文明则几乎不作识别任何一个诗人的名字？这些比较与问题，不单单有趣：它们告诉我们文化身份认同形成的根本要素。没有比较，我们甚至将不能够察觉这些差异与问题。因此，我们不可以仅仅就中国自身及其传统来理解她；相反，我们必须同时理解，中国身处一个可被称为“全球古代遗产”的特殊文化结构之中。有些欧洲与美国院校，业已明了古代研究需要借着比较来进行。例如纽约大学的古代世界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World）与慕尼黑路德维希希麦色米利安大学的古代世界中心（The Centre for Ancient Worlds）。

当然，有些学者可能会选择彻底摒弃使用比较的素材。但这具有两点含义：其一，古代中国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截然不同，不可比较。这种看法是植根于粗糙的过度自信。其二，其他研究领域的同行身上，没有什么值得研究早期中国的学者学习。这种看法与整个汉学的历史相左。

就我所知，人文学及社会科学领域内，并未有任何重要理论或方法是首先从中国研究里发展出来的——中国没有，日本没有，西方也没有。不论哪个领域，我们现代的分析方法，甚至我们的词汇（只要想想“哲学”或者“民间文学”等词）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其他文明的研究。因此，摒弃比较研究的想法，不仅在历史上是错误的，在智性上也是薄弱无力的。即使我们不能将从某种文明所得的洞见用于分析另一种文明，比较的观点角度也可以刺激我们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舍此观点角度是无法发现的。

除此之外，尚有另一种理由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孤立地研究中国。如果中国是如此独一无二，而只能从一种传统观点角度去理解她，即如果任何其他外部的文化范式、观点角度与问题都很大程度上无助去理解她的话，则反之也必然地正确：关于古代中国的研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中国以外世界的事情。研究古代近东或地中海的人，不会从我们对中国的知识里获得任何东西。我们相信这是真的吗？我们希望这是真的吗？换句话说，刻意无视其他古文明的古代中国学术界，到头来必然会破坏与收窄中国学术，甚至破坏与收窄中国于世界的地位。如果想挑战至今仍然主导欧洲与美国古代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断不能靠自我隔离的、民族主义的、自我边缘化的中国中心主义来实现。相反，我们必须展示古代中国是如何与整个古代世界连接的，并且是当中可比较的一部分；同时，必须展示中国研究如何能够提供新的观点、角度与问题，不仅对应中国也能对应整个古代世界。

单语主义与单一文化主义不单是众多方法论问题之一。相反，它们是后设方法论的问题：它们是所有其他问题的原初问题。我们无法承担忽视它们的后果，因为它们直接影响所有其他方法论问题。在此基础上，以下意见所关注的，既是我们研究领域目前的状况，也是一些我们或者可以从比较观点角度获得的特殊看法。

我们现在面对的根本问题相当简单：是否说境外学术与中国学术不

相关，并不仅因为语言差异或者获取的难度。毋宁说它关注的角度不同、试图回答的问题也不同，并且本质上是比较性的？我相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不是说完全或者普遍如此，但至少某种程度上如此。若然，这种情况就影响了方法论的所有层面：如果我们对不同类型的问题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自然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追问哪些问题或者不追问哪些问题，这恰是方法论的根本所在。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境外学术已经发展出了新的方向和角度。其中某些进路和角度对早期文献（包括新近发现的手抄文献）的研究向已有假设提出了有力挑战。就此而言，这些进路并非只存在于自己的小世界里，也不是仅仅和当前中国学术平行，就像两条从不交叉的平行线。事实上，这两条线有不少交点，也对彼此提出了挑战。如果来自其他学术传统的著作很少在中国的出版物里被提及或驳斥，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挑战被轻轻躲过了。这一明显缺憾的代价就是积久成弱。“国学”若想成功，学人便不能忽视异域学术，故步自封于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内。真正成功的“国学”应能批判性地与当代异域“汉学”接榫，取其所长，改正或扬弃其所短。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国学”必须与境外学界的当下思潮同步，而不仅仅为过去的“大人物”所障目。以下将列举当下的几个议题，我认为它们目前所受的关注不足，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批评。

二、今日西方“汉学”：欧美缘何迥异？

20世纪早期，欧洲及其后的美国汉学界主要植根于语文学。特别就北美而言，这种情况早已改观。我不知道美国和加拿大的哪所主要学术机构里还有“汉学”（Sinology）系——我们开设的系都称为“东亚研究”“东亚语言文明”“东亚语言文化”等。事实上对很多学者而言，汉

学这一学科，以及语文学这种过往用作界定它的方法，^① 都已经是明日黄花。他们眼里，这些都是前朝的旧物，要抗争并且消灭其一切遗存。（让我深感不安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我的某位同事有一次十分鄙薄地抱怨“语文学这个黑洞”。）尽管并非所有人文学领域有相同情况，^② 但语文学在西方的汉学界正苦苦求存。有意思的是，欧洲并非如此。和北美的一些规模较大的系相比，那边不少甚至较小的系——至少就那些依然关注前现代中国的系而言——都对古代汉语的语言学和语文学训练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目前最优秀、最有雄心，也最严谨的新出版的古汉语教科书是用德文写的，即苏黎世大学的高思曼（Robert Gassmann）和毕鹗（Wolfgang Behr）合著的三册皇皇大作。在此之前，最好的古汉语语法著作是德国学者加贝伦茨（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首次出版于1881年的作品。西方最好的古汉语辞典则是用法文和俄文写的：俄文的是O. V. Oshanin著的四卷本《大汉俄辞典》（*Bol'shoi kitaisko-russkii slovar'*），^③ 法文的则是七卷本《利氏汉法辞典》（*Le Grand Dictionnaire Ricci de la langue chinoise*）。不论是德文的语法和课本还是法文、俄文的辞典都没有用于北美的古汉语语言和语文学教学。唯独柯睿（Paul W. Kroll）这位唐诗专家兼汉学界顶尖的语文学家，在2015年出版了权威的《学生的古典及中古中文字典》（*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d Medieval Chinese*）。^④ 这本重要的、由美国学者所撰的古典中文字典，现已成为西方汉学的单卷参考书。

① 参见 Edward H. Schafer, "What and How is Sinology," *T'ang Studies* 8—9 (1990—1991): 23—44。

② 标志语文学复苏的例子是新近出版的 *World Philology*, ed. Sheldon Pollock, Benjamin A. Elman, and Ku-ming Kevin Cha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近几年，有一本新编期刊面世，名为 *Philolog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s, Cultures and Texts*，由 Francesco Benozzo（博洛尼亚大学）作编辑发起，首期于2015年12月出版。

③ Moscow: Nauka, 1983.

④ Leiden: Brill, 2015.

尽管如此，与中国学者相比，欧美学者研究中国早期文献时有着相当显著的方法差异。这些差异并不琐碎，而是反映出颇为不同的学术传统；或者更准确地说，反映出欧洲与北美之间横亘着深厚的语文学传统的差异，汉学只是一个侧面。当然，北美也有不少学者，如柯睿在古代中国文本，包括早期手抄文献的语文学研究领域堪称大家；但今天，他们更像是个体的声音，而非广阔学术传统的一部分。当然，中国研究里有些领域最优秀的著作出自美国，譬如文学领域（这领域里最好的语文学著作有些也出在北美）。因此，最新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里，只有一位学者在北美以外工作，即在著名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职的贺麦晓（Michel Hockx），现代文学部分有他的两篇短文。所有其他学者都就职于美国的学术机构。当然，一些著名的欧洲学者也足以跻身此列，但主要的研究成果还是出自北美。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期中国手抄文献研究领域，乃由在欧洲工作或至少受训于欧洲的学者所主导。近年，有学者们致力于编纂手册，比如《早期中国手抄文献：文本、语境及方法》（*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Texts, Contexts, Methods*），由毕鹗（Wolfgang Behr，苏黎世大学）、麦笛（Dirk Meyer，牛津大学）与本人合编。至今有十五位合作的著者，其中包括编者高奕睿（Imre Galambos，剑桥大学）、耿幽静（Joachim Gentz，爱丁堡大学）、马克（Marc Kalinowski，巴黎高师）、劳武利（Ulrich Lau，海德堡大学）、Rudolf Pfister（苏黎世大学）、风仪诚（Olivier Venture，巴黎高师）与纪安诺（Enno Giele，海德堡大学）。他们都是在欧洲院校任职的欧洲人；另外，李孟涛（Matthias Richter，科罗拉多大学）和我本人都在德国受业之后才到美国。我们原本也可以邀请两三位美国学者（但同时增加几位欧洲学者），但正如《剑桥中国文学史》不可能在欧洲完成一样，《早期中国手抄文献》这部手册也不可能——至少按照其设计初衷不可能——不依赖在欧洲工作或接受全部学术训练的学者们。两种情况的结果都会大不相同。还有，至今没有投身

于早期中国手抄文献的北美学术社团，就在2004年，欧洲早期中国手抄文献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Manuscripts）便成立于汉堡，如今它也包括了不止北美成员。这个学会于2000年、2004年在汉堡，2008年在苏黎世的前三个讨论会论文选都已经出版，也很容易找到。^①其他国际讨论会也已于2012年在巴黎、2014年在海德堡举行。^②

但是，上述情况完全没有反映在中国举办的早期中国出土文献国际学术会议上。这解释起来不容易：大部分原因和汉学及中国研究自1930年以来的发展有关，^③也和美国随后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和学术上的压倒性优势有关。我不会就此深究；但我要说尽管北美的中国研究在西方占据优势，欧洲对古典中国文本的语文学研究却不同于任何其他领域，有一条连绵不绝的传统，迄今也未被超越。现在看来，这条欧洲传统和专长并非过气的古董；相反，对于今天早期中国手抄文献研究这一崭新、活跃的国际化学术领域而言，它具有重要的核心意义。其长处首先来源于植根传统的《圣经》语文学和欧洲经典语文学。譬如说加贝伦茨就并非汉学家，而是受到语文学传统广泛训练的普遍语言学家。其第二点长处在于欧洲汉学完全以语文学为基础；第三点长处是一条简单的事实：最好

① 2000年会议的部分论文发表在 *Monumenta Serica* 51 (2003)；论文摘要发表在《国际简帛研究通讯》2000年第6期。2004年的部分论文发表在 *Asiatische Studien/Études Asiatiques* 59 : 1 (2005)；论文摘要发表在《国际简帛研究通讯》2004年4 : 1期。2008年的部分论文发表在 *Asiatische Studien/Études Asiatiques* 63 : 3 (2009)。迄今为止，这个协会已经发表了四次通讯，见其网站：<http://www.zo.uni-heidelberg.de/eascm/newsletter.html>。

② 全部五个讨论会的论文题目，见以下网址：<http://www.zo.uni-heidelberg.de/eascm/workshops/past-workshops.html#2014>。

③ 参见拙文“*The Emigration of German Sinologists 1933—1945: Notes o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Stud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8.4 (1998) : 507—529；中译文《德国汉学家在1933—1945年的迁移：重提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载《世界汉学》2005年第3期，页15—37。此文收入《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之研究》，张西平、李雪涛，〔德〕马汉茂（Helmut Martin）、汉雅娜（Christiane Hammer）主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17—258页。

的欧洲汉学家（包括在北美任教的以内），就像他们的先辈一样，不仅能够阅读中文和日文的学术著作，并且还能阅读其他欧洲语言的学术著作。他们起码都能阅读英文、德文和法文，某些同行还会俄文、意大利文或其他语言。对外语著作的基本阅读能力是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拥有（或缺乏）这一能力影响到早期中国手抄文献研究的方方面面。它影响到世界各地的每位学者；对我们中间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其影响尤其深刻。

回到手抄文献研究本身来说，方法论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从考古学到古文字学，从语音学到历史学，从宗教到哲学，等等。因此，就《早期中国手抄文献：文本、语境及方法》这本手册，我们开始时计划编撰以下章节：

第一部分：材料、历史及比较语境

- 现有早期中国手抄文献之分类研究
- 考古学语境及方法之相关性
- 古文明墓葬里的文本

第二部分：抄写及书写，文本和抄本的制作过程

- 手稿学：书写的物质及技术层面和抄本之制作
- 句读
- 古文字学：传统及现代之发展
- 书吏之手
- 字形异体
- 文本批评
- 古文字学和地区化的字体

第三部分：早期中国手抄文献及语言史

- 语言学的角色
- 语言交流及多样性

第四部分：文本及抄本产生的社会及思想语境

- 阅读和书写的社会学
- 文本、哲学及抄本文化的诞生
- 引文、被标记的言辞、作者身份及文本共同体
- 书写、口述性及文本的传承

因此，我们设计这本手册的目的如下：（1）提供当前早期中国手抄文献研究状况的完整描述；（2）界定用于反思这些文献的种种观点角度；（3）为师生提供可以应用于其研究的具体指导。为此，我们召集了一批前沿的专家，他们具备我们试图涵盖的不同观点角度和进路。现在未能预计何时才会完成已计划好的手册，因为很多参与者为自己的项目而忙碌着；但我们计划的进路大纲，对于任何出土文献认真而系统的研究，依然占据中心地位。

与中日或北美学术圈惯常提出的问题相比，这里涵盖的进路范围要广泛许多。当然，我们也对当今中国学界的古文字学、语音学、思想史等传统领域感兴趣。但此外，从宏观和微观两种层面对文本进行思考是必要的：在微观层面上，我们讨论了句读、抄写差异以及手抄本的原始制作过程里涉及物质及技术种种细节。宏观层面上，我们反思诸如著作权、传播以及早期中国阅读和书写的社会学等问题。另一方面，没有一个章节讨论如何把这些手抄文献纳入传统视野里的思想史。这是经过斟酌的决定：在把文本划归某个特定哲学“流派”或者猜测该文本的作者可能是谁之前，学者首先必须思考这文本（作为思维的产品）以及我们手中的具有物理性质的文献（作为物质的产品）本身是什么。事实上我们当然永远不可能孤立地看一个文本。然而，具有核心重要意义的是我们试图限制经典传统对我们分析的影响，并且必须试图不从传统的假设出发——否则，我们就有可能落入一叶障目的危险，发现自己“已知”的或者试图发现的，却看不见其他或许更加有趣的可能性。尽管

今天中国学人每每称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但使用传统数据和新近出土数据的时候却经常并不平衡；相反，特别是涉及早期哲学手抄本的时候，主导趋势似乎是在把新发现的资料归入传世传统的范式之内。由于我们永不应该丢失传统视野，方法论原则上，检验新出土材料要从它们本身出发；在此之前，不要把它们硬套入某种传统视野来进行解读。

三、早期中国文献研究的五种观点角度

下面将介绍我近年来致力的五个问题。显然，这并非早期中国抄本研究里唯一有意思的观点角度；它们只不过恰巧是我的关注点，而且可能代表当下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问题、显现的观点角度，与中国学界现时所讨论的有所不同。就前两个问题，我已经发表过中英文文章^①。由于这些出版物都很容易找到，我这里就只简单归纳一下主要的几点。

^①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nalysis of Textual Variants and the Modes of Manuscript Production in Early China,” in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4.1—4 (2002): 143—181；中译本（有些严重误译）题为《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之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载《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陈致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9—385页；“Quotation and the Confucian Canon in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The Case of ‘Zi Yi’ (Black Robes),” in *Asiatische Studien / Études Asiatiques* 59.1 (2005): 293—332；中译文题《引据与中国古代写本文献中的儒家经典〈缁衣〉研究》，载《简帛研究》2005：7—29；“Excavated Manuscripts and Their Socratic Pleasures: Newly Discovered Challenges in Reading the ‘Airs of the States’,” in *Études Asiatiques/Asiatische Studien* 61.3 (2007): 775—793；中译增补本题《从出土文献谈〈国风〉的诠释问题：以〈关雎〉为例》，载《中华文史论丛》2008.1：253—271。

（一）口述性的问题

在详细讨论早期手抄本里引“诗”的文本异文时，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早期文本传播的强烈口述因素，也必须将这一发现对早期文本制作方式的影响考虑在内：它们有时被抄录，但有时则是根据记忆默写的。我强烈反对某些学者想象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抄录是早期中国文本滋生——或者说是文本为墓葬制作——的唯一（甚或说主导）方式。就我个人所见，这一假设与比较研究的证据相龃龉，也与早期中国抄本本身提供的证据相龃龉。我依然坚持几年前发表的下述结论：

我研究了六种出土文献中的“引诗”的文本异文，研究的结果使我假定曾经存在一个具有较大文本流动性的阶段，当时某个措辞大体稳定的文本能够化身为多个相互独立的写本。我认为，尽管这些版本都从一个不可能重新恢复的原本衍生而来，但它们多样的书写形态并非来自一个单一的原型。严格说来，在这些不同版本的背后，并不存在唯一的原始书写文本。但这也并非等于是说我们要排除这样一个可能：这个不能恢复的原始文本最初也是以书写形式创作的。只能说这个文本在被创作出来以后，并没有按照文本族谱模式的谱系链连续地流传下来。因此，我不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在早期中国，一部作品的文本链条主要是作为写本而获得地位，并且主要是通过抄写而流传。^①

（二）阐释有传世文本为参照的出土文献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以传世文本为参照解读早期出土

^①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nalysis of Textual Variants and the Modes of Manuscript Production in Early China,” 149—150.

文献。^①以《诗经》为例，我提出我们无法逃脱一种难以解决的困境：

如马承源先生等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孔子诗论》对《关雎》的讨论表明了《小序》“绝不可能是孔子论断的真传”^②。但如果《关雎》是如此，那么《毛传》对《国风》的整个解读方法也一定如此。《孔子诗论》没有对任何一首《国风》进行历史上的讨论。但我们要再跨一步，承认《关雎》在《毛诗》中的文本本身不是《孔子诗论》里谈到的《关雎》。《毛传》对“窈窕”的定义与《孔子诗论》的讨论和大量其他证据有根本上的冲突。^③有如此之多的材料直接动摇《毛传》，这一点是很独特的，并有可能和《关雎》显著的地位有关。但正因为《关雎》似乎带有示范作用的显要性，我们必然对整个《毛传》对《国风》的历史性解读，以及对许多《诗》的单个字词的注释，都产生疑问。就我们目前可以推断的来说，这种训诂的诠释在《毛传》以前并不存在。至少在从《孔子诗论》到帛书《五行》之间的一百来年中持续存在的、地位十分显著的另一种诠释传统里好像没有解释单个字词的迹象。认真地看，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难题：现在我们已能怀疑《毛传》的注释及其支持的历史解读，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们的。虽然我们知道组成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的《诗》是与流传的《毛诗》同音字词，但是，一旦除去《毛传》的单字训诂，我们就无法弄清这些字到底写哪些词。换句话说，把我们对《孔子诗论》的解读建立在我们对《毛诗》的理解上，这种惯用研究程序根本上就是自相矛盾，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在摒弃《小序》的同时接受《毛诗》文本中的字词，因为这一文本根本就

^① 亦见：William G. Boltz, “Manuscripts with Transmitted Counterparts,” in *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 ed. Edward L. Shaughnessy. Berkele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7, 253—283.

^②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40页。

^③ 包括帛书《五行》《论语》《荀子》、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儒林列传》刘安《离骚传》、刘向《古列女传》对《国风》和《关雎》所作的评论。

不是“原文”，或存在先于《毛传》的训诂注释。这一文本流传的形式和意义是通过《毛诗》和郑玄的《毛诗传笺》才存在的；我们手头没有《诗》的原文。我们所有的只是《毛诗》——一部通过一种特殊的诠释方式构筑的文本。^④

（三）引文和平行文本的问题

我认为重要的另一点方法论问题是引文与平行文本。^②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某篇文本特殊的写作和修辞特征，而且涉及其性质、完整性及我所谓在其“文本共同体”（即认为这篇文本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直接受众）间所处的位置。在早期中国，文本间普遍存在大量的平行性。范围庞杂的文本间多次出现类似的历史轶事，甚至长篇幅的叙事；某些特定的话不仅出现在不同的文本里，甚至出自不同的发言人之口；^③整篇的文本可能都是由“建筑方块”（鲍则岳）搭建成的，即短篇的文本单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重组，导致早期书写的“复合性特征”。^④

在早期中国（以及研究早期中国的现代学术界），读者并不觉得同一

^① 《从出土文献谈〈国风〉的诠释问题：以〈关雎〉为例》，第268—269页；“Excavated Manuscripts and Their Socratic Pleasures: Newly Discovered Challenges in Reading the ‘Airs of the States’,” 791—792.

^② 有关古典中文文献的引文，参见法国期刊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17 (1995) 特别主题期号 *Le Travail de la citation en Chine et au Japon*。关于早期中国文献的引文问题，完整讨论可见于即将发表的文章。该文由 Michael Hunter 与 Martin Kern 合著。

^③ See Paul Fischer, “Intertextuality in Early Chinese Masters-Texts: Shared Narratives in *Shi Zi*,” *Asia Major* 3rd ser. 22.2 (2009): 1—34; Michael Hunter, “Sayings of Confucius, Deselected”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2).

^④ Boltz, “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 i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ed. Martin Ker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50—78.

段话读两遍（或者更多遍）是件麻烦事。^①平行文本通常不被看作引文，而且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间不同的措辞也通常可以接受；不少古训都被广泛复述或变形，出入于书写或口述的传播之间。事实上，学者们并不把平行版本看作削弱彼此的可靠性，而是相反把它们看作相互支持。^②这是个方法论的选择。传统学术——如今得到例如香港的 CHANT 数据库这样巨大的文本数据库的支持——总是试图界定暗用的引文或平行文本，追踪个体文本可能的作者及特定的“思想流派”之间历史性和思想性的联系。^③但它并不质问为什么不同文本会平行而有差异，或者平行文本和引文这种无所不在的现象告诉我们哪些关于早期文本形成及传播的消息；它也没有充分探讨引文使用本身是如何作为作品的修辞特征的。譬如说，采用历史人物的直接引文，尽管他们的实际言辞不可能被记录下来，这样的写作手法意味着什么？其所从属的文本共同体显然把这些引文当作出色有效的修辞，这又透露了哪些消息呢？

① 传世文本和出土文献之间叙事重迭的例子包括了一系列的文本，如清华竹简里显示的与《尚书》、《吕氏春秋》、《逸周书》、《世本》及其他文本的平行 [见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马王堆也发现了与《战国策》平行的文本 [福山由美子（Yumiko Fukushima Blanford），“《战国纵横家书》帛书研究”（“Studies of the ‘Zhanguo zonghengjia shu’ Silk Manuscript”），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89年]；郭店竹简“穷达以时”这篇不长的文本里，第10—13号简上提及了伍子胥故事，这与《韩诗外传》《说苑》和《荀子》的措辞重迭（《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28页，245]；郭店简“尊德义”第22号简上有一行十一个字的句子，这与《论语·泰伯》里“民可使由之”一段平行，第28—29号简上有另一段十个字的话，和《孟子·公孙丑上》里“孔子曰德之流行”一段平行（《郭店楚墓竹简》，第56—57页，174）。

② 这种态度的最新例证是清华竹简里与《尚书》及其他数据平行的文本是如何被讨论的。在不少地方，编者都提出手抄本比传世本优越，假设了一条文本传说的传播史；但他们从没有质疑传世本的来源或真实性，也没觉得必须以一个版本为准摒弃其他版本。相反，有意思的是，目前讨论的部分动力来自于一种信念，即尽管手抄本有大量异文，但它还是为传世本的基本可靠性提供了依据。

③ 除了古文字学分析外，在早期中国手抄文献研究里这是目前为止最受瞩目的话题——尽管事实证明清晰鉴定的“学派”这个观念颇成问题；见 Mark Csikszentmihalyi and Michael Nylan, “Constructing Lineages and Inventing Traditions through Exemplary Figures in Early China,” *T'oung Pao* 89.1—3 (2003): 59—99。

尤其有意味的是，直接引文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借此作者表明这部分文本不同于其他部分，别有来历，而且这部分文本自觉参与并延展了一个更大的文本宇宙。^①例如，像《荀子》这样的文本，我们通常发觉所使用的“曰”（或“故曰”）被诠释为“我说道”（或“因此我说道”）；但有更多情况下，它表示恰好相反的意思——非第一身的“有人说道”（或“因此有人说道”）。这标志着后续的语句并非言说者本人的说话，而是引用了传统智慧的隽语。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充分完成的论述去辨别这类引文；反而，我们太快假定早期文献通常都强调个人意见（与个别作者），多于表达其他众人意见。

早期中国作者的引文来自多样散乱的文本、权威和其他各种资源。经典文本的引文，特别是引《诗》，频繁地出现在早期手抄文献里，而这些文献都是当时哲学和政治话语的一部分，包括郭店和马王堆文献中的《五行》篇里标记或无标记的引文^②，乃至上博《孔子诗论》的简短指令^③。这些手抄文献确证了中国早期《诗》文本的大量流传和相对稳定性，尤其是在南方的故楚之地。传统经典里另外两部也与之相类似，尽管其措辞稳定性不如《诗》。《易》如今已经见于上博，来自公元前300年左右，也见于马王堆，约公元前2世纪。《尚书》在清华竹简里有相当部分的平行文本。^④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北方发现类似的手抄文献证据，尽管北方传统被认为是这些文本起源和传承之地。难道这仅仅是保存过程中的偶然或者考古学上的幸运？或者说它告诉我们这些经典文本在早期中

① 见 Richard L. Schultz, *The Search for Quotation: Verbal Parallels in the Prophets*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9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Supplement Series 180)], 211—212。

② 见《郭店楚墓竹简》，第147—154页；及《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7—27页。

③ 我沿用上博编者拟定的《孔子诗论》这个标题，尽管这个标题容易让人望文生义，错以为这篇文本整个都出自孔子手笔。相反，其中只有几个段落归入孔子名下。

④ 见目前发表的清华竹简第一卷。

国不同地域的存在和流传的消息?

我们还要考虑早期文献是如何引用文本的。尽管《诗》里的作品被引用时多数都被仅仅称为“诗”(有时候称为“大雅”或“小雅”),《尚书》在引文里却从不被概括性地称为“书”(这种情况在传世的早期文本里也可以发现)。^①与之相对照的是,手抄本如《缙衣》(郭店、上博)和《成之闻之》(郭店)所引用的章节标题则必与传世《尚书》或者是和《尚书》语言风格类似的文献里的章节标题完全一致。^②清华竹简里,我们进一步看到平行叙事章节的标题与传世《尚书》不同。^③同时,正如清华大学博物馆藏简里《尚书》的平行文本一样,《尚书》引文和传世本相对校时显示比《诗》的引文更大的变异性,^④包括句子结构、字数和选字(假借字及意义上不同的词)上的差异。整体而言,具有《尚书》风格的引文表明当时存在的一大批文本材料,它们直到战国晚期都还没有被划分为边界固定的经典,声誉也可能不如像范围清晰的《诗》这样显要。和郭店、上博里的对应章节相比,传世本《礼记·缙衣》给了《尚书》引文更多的分量,这表明汉代《尚书》地位的上升。^⑤此外,尽管其特定的标题表明个别的《尚书》文本段落有确定的身份,它们的具体措辞却没有严格

控制,因为它既没有可以帮助记忆的严格形式特征(譬如《诗》的韵律音节),也没有古地中海地区那样的“经典语式”。^①这样看来,早期手抄文献显示出这些《尚书》风格的引文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地位呢?它们是否符合《尚书》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是一部经典的假设?

早期中国引文的一个有趣特征是归于匿名权威的引言的泛滥,譬如说“君子”(例见上博《昔者君老》篇)^②、不确定的“子”(例见《缙衣》)或“圣人”(例见出土《老子》)。^③自汉代以来的学者已经回溯性地把许多这些身份不确定的权威鉴定为特定的历史人物,通常是孔子,例如东汉的《汉书·五行志》和《潜夫论》都把《繁辞传》里的一处“子曰”定为孔子曰,^④或者说王充(27—100)把《公羊传》里的一处“君子曰”也定为孔子曰。^⑤然而,极少证据表明汉代以前的作者们会把这种“引文的姿态”(史嘉柏)^⑥理解成出自某位特定个人的实际引文。^⑦有关或来自某位“君子”的陈辞具有程序化性质,这在郭店《成之闻之》里尤其明显,

① 譬如《圣经》里的《申命记》12.32,“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以及《马太福音》5.18,“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埃及智慧书、巴比伦史诗还有古代和经典的希腊文本里也可以见到类似表述。见 Jan Assmann, *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8—120。早期中国的这种经典语式也有一个孤例,即《吕氏春秋》,据说它曾被悬挂在咸阳市门,凡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

②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第241—246页。

③ 如“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亡为而民自化”。见《郭店楚墓竹简》,第113页。

④ 《繁辞传》原文见四部丛刊本7/5b。《汉书》及王符之言,见《汉书》27.1376,《潜夫论》32(四部丛刊本8/9a—b)。

⑤ 《论衡》27(四部丛刊本8/15b)。《公羊传》里的“君子曰”,见庄七年(四部丛刊本3/7b)。

⑥ Schaberg, “Platitude and Persona: Junzi comments in the Zuozhuan and beyond,” in *Historical Truth,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Ideolog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From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 Helwig Schmidt-Glintzer et al. (Leiden: Brill, 2005), 4.

⑦ 不过有一个例外是上博《弟子问》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五册,第267—283页)里,一位“子”(可假定为孔子)回答某位已知的孔门弟子问。

① 例如《荀子·修身篇》的结语(四部丛刊1/19a—b)。《礼记》全本仅包括了三处概括性的“书曰”,一见《坊记》,余见《丧服四制》。

② 《缙衣》引文,见“Quotation and the Confucian Canon in Early Chinese Manuscripts: The Case of ‘Zi Yi’ (Black Robes),” in *Asiatische Studien / Études Asiatiques* 59.1 (2005): 293—332; 中译文《引据与中国古代写本文献中的儒家经典〈缙衣〉研究》,载《简帛研究》,2005: 7—29。《成之闻之》引文,见《郭店楚墓竹简》,第166—170页。

③ 手抄本与传世本不同的标题,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157—162页。这里,最后的一条竹简背面有很长的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自以代王之志”,而非传世《尚书》里简洁的“紧滕”。把两个标题的任何一个称为“原题”,另一个称为“晚出”都是错误的。

④ 有关后者的研究,见柯马丁,“The Odes in Excavated Manuscripts,” in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ed. Martin Ker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149—193页。

⑤ 见柯马丁,“Quotation and the Confucian Canon,” 303—304, 317—318; 《引据与中国古代写本文献中的儒家经典〈缙衣〉研究》,13, 22。

这可能表明后者并非引文，而是强调文本中紧要部分的手段。^① 换用史嘉柏的话说，“君子”、“子”和“圣人”都可以理解成人格化的多种修辞功能，包括带标记的判断或对古训的援引。^②

这样理解的引文无须谨守事实：哪怕言辞被归于诸如孔子、周公等特定历史人物名下，这都可能仅出于修辞目的，不必信以为真。某句话在文本甲里被归入某人名下，在文本乙里就别有所出，这已是司空见惯。当然，这种情况并不要求我们判断谁是历史上“真正的”发言者；更可能的是，它仅仅表示某些固定的辞令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应用或归于某人名下，含义也每每不同。^③ 不论哪篇文本里归于哪位历史人物名下的话，都不能望文生义地当作那个人物的言辞。这些归名只能表明在文本共同体里，这位假定的历史发言人是一位已知而且重要的人物，其名字给某句话添加了特别的意义。早期作者们一般都避免自称其名，但却很乐意把某句话归名他人。目前发现的早期手抄文献里，还没有哪篇提到自己的作者或引用另一篇书面文本的作者，但不少文献引用的话语却都有名有姓，表明个体作者身份远不如援引传统或权威来得紧要。

引文有多种功能。其一就是修辞性地把一段新的话语与听众心目中的早期权威文本或显要人物相联系。带有引文的文本因此透露了它们所从属的文本共同体的某些消息：关于它们的历史倾向、文化典范、继承的思想脉络，还有行为模范。我们因此不应当急于鉴定它们出自历史上谁人之口；相反，我们应当考虑它们是真正的引文还是带标记的言辞的问题，作者声音的问题，最后还有单一文本里复合了多重文本来源的可能性。此外，采用明显引文的手段所表达的不仅有文本之持续性及历史人物之显要，还有文本实践本身。通过引文，新文本指涉了早期的文本，

并把两者都登记在了共同的文本系统里；同时，文本或来自过去的历史性发言人都以当下的文化语汇进行了想象或再想象、建构或重建。

（四）文本数据库与合成文本

西方学术界对早期中国文献研究当中，由鲍则岳（William G. Boltz）所提出文本的“建筑模块”（building blocks）概念，已经广被接受。这概念意谓，很多文献由较小的文本单位所建构而成。这些较小的文本单位在不同文献中以不同设置方式重复出现。这理论解释了不少相似的简短文本段落横跨很多早期中国文献。它同时推翻了“稳定”的概念，即独立地由单一作者完成的文本；相反，它主张很多文本并不是真正的创作品（意谓由单一思想所产生的成品）而是编纂品，因此代表了不同的源头，而这些源头的原创者通常都是无名氏。鲍则岳的理论，就很多早期哲学文本的情况来看，证实是有说服力的。我相信这理论同时能应用于早期诗歌。例如在《诗经》，尤其大雅与小雅，我们发现当中有一系列作品将韵文与散文素材结合在一起。举例来说，《江汉》一诗毋庸置疑并非出于单一作者的手笔。相反，这首诗歌的第一、二及六段由典型大雅的语言所组合而成（包含许多其他大雅诗歌的平行文本），而第三、四及五段则由完全不同的语言（包括散文语言）所写成，不含任何在《诗经》其他地方见到的平行文本，却与青铜铭文与《尚书》语言有密切关联。我们不知道现时我们所见《江汉》的版本从何而来，但它凸显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诗经》整体诗歌的文本完整性。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我们必须谨慎检验尤其是较长篇的诗歌，以判断它们事实上是否为不相关联并独立自存的文本，抑或其语言揭示了单一诗歌内形式上不一致与不连贯。就我所知，这种研究尚未系统地进行。

这种研究之所以未曾出现，理由大抵很简单：我们只不过假设了

① Schaberg, "Platitude and Persona," 6.

② Schaberg, "Platitude and Persona," 15.

③ 譬如说《楚辞》里的《渔父》被认为是渔父劝说屈原之作；而在《孟子·离娄上》里，同一首“沧浪之歌”就成了“孺子歌”，孔子还对之有所点评。

“诗三百”就是有三百首诗。在即将展开的研究中,^①我借着对照“合成文”(composite texts)与“文本数据库”(textual repertoires)来质疑这个假设。引申鲍则岳的理论来说,我认为早期中国文献有很多个案——包括《诗经》但肯定不限于诗歌——个别句子、段落或故事的平行文本,在文本数据库中会出现:题目、主旨、意念与整套表达方式与此相关。因此,我们看到“周颂”里有很多平行文本,它们所用的字词相异,所表达的意思却相同。这些诗歌,就其本身单独而言篇幅太短,不足以用作宗庙的演出;相反,它们很可能是一组文本,或可能是单一较长的文本,而必须整体地理解它们。《左传》与《礼记》有一很典型的例子,有一组诗歌被重构为一套名为“大武”的歌舞表演项目中的元素:^②在《左传》中,征引个别诗歌的引文,会就整体的“武”之中被指派为不同的“章”(sections);但在《诗经》里,这些“章”都是简短而具有自己的标题的独立诗歌。这种矛盾,与《礼记》所得的证据加起来,强烈指明“武”确实是单一文本材料或“数据库”,而“周颂”则纯粹是零散的诗歌。

从“国风”可见另一个相似的例子。在清华简全集中,标题为《耆夜》的篇章中发现了另一版本的《蟋蟀》,与《毛诗》“唐风”所载不同。流行版本有廿四句四音节句,分成三段;清华简版本却有三十句(有些句子不能完整地显示于竹简上),其中三句由六个字符而非四个构成。廿三个完整可见的句子中,只有三句与流行版本吻合;除此之外,尚未发现很多词汇变化、句顺颠倒、附加句子,与不同韵调等情况。形式上,

^① “Coming into Being: *The Shijing*”, 载于一本论《诗经》与荷马诗歌的书,由 Fritz-Heiner Mutschler 所编。

^② 详参《左传》宣公十二年;“乐记”[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1023—1024];王国维,《观堂集林》(台北:世界出版社,1975),2.15b—17b;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6),239—272页;C.H. Wang, *From Ritual to Allegory: Seven Essays in Early Chinese Poet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8—25; Edward L. Shaughnessy, *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165—195; 还有其他。

流行版本具有诗经典型的三段式重复,而清华简版本却完全没有。据《毛诗》序言所说,《蟋蟀》是针对晋僖公(公元前9世纪晚期)所作,以讽刺他过度节俭;而清华简中,此诗由周公于一个宴会中唱出(或许是即兴而为之)。时间上比《毛诗》所说早了两个世纪。

很多学者争论两个版本的《蟋蟀》代表同一个文本的两种版本,还是两首不同的同名诗歌(也争论哪一文本应是“更原先”的)。我相信这是不确当的论题。无疑,这两个文本紧密地相关;但它们也确实非常不同,因此不能视为同一首诗,然后设想不知什么因由,这首诗随着时间改变了。相反,我认为这两首诗是两个独立分离,但以相同主题与诗歌表达的数据库的创作成果。或许以相同主题与数据库的诗歌创作只有这两首,或者有更多。断不能说其中有某一作品是“原创”的;所有这些诗歌,简单而言都是以不同方式、很大程度上使用相同的语言,但表达相同的主题的作品。或许,由共享的数据库所产生不同版本的诗歌,情况恰如孔子的“复制”一样,将原先全体三千首诗加以修剪减至三百首(据司马迁所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某一版本被挑选出来(并做进一步编辑)而其他版本被放弃了;此外,这个过程同时是从不同的历史脉络及其产生的诠释中做出挑选。《蟋蟀》是迄今唯一我们在《毛诗》以外所见过曾被完整地征引的诗。尽管如此,一个例子足以提醒我们要思考关于《诗经》的诗歌其本质与创作过程时,有全新的可能性:这些诗作不是由单一作者个别独立地创作的结果,而是编纂并且由文本材料合成而来,这些原材料在当时被很多受过教育的人所共享。如果此说正确,则我们对《诗经》的诠释将会产生极大的改变,并会引出关乎早期中国诗歌的合成与传播的根本性的议题,及有关我们研究的全新的方法论问题。

(五) 作者身份的问题

最后,容我提出另一点方法论议题,就是早期中国文献研究的作者

身份问题。有关出现在早期中国手抄文献里的某些哲学文本，其中一个最有争议性问题便是：谁是作者。有些学者坚持认为郭店《老子》残篇的作者就是老子，还有人坚信郭店和上博《缁衣》的作者是子思子，也有人提出上博《诗论》的作者是子夏。以上每个例子中，作者身份的归属都被用来决定文本整体的意义及其在传统思想史里的位置。子思的这个例子里，作者身份的归属与（同样含混的）传世文本证据相结合，用以给包括《论语》在内的一系列传统文本断代。^①然而，我们所了解的传统思想史框架实际上都来自汉代，决定其形式的主要是经过两次删减保存在《汉书·艺文志》里的西汉晚期皇家秘阁藏书书目。

如米歇尔·福柯在他著名的文章《什么是作者？》（“What is an Author?”）^②里注意到的，“作者”的意义主要并非文本的来源，而更多是作为文本的功能：界定作者决非是对文本的起源做出某个事实性的陈述，而是根据读者对此人持有的特别观念，给文本赋予了具体的意义。借此，“作者功能”（“the author function”）就在“意义的无限滋生里扮演了经济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rift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meaning”）：它大大限制了一篇文本能够被理解、阐释的多种可能。不妨想象一下这种假定的情况：倘若我们把一篇无名氏的军事或医学文本归入孔子或老子名下，结果就大大不同了。这种作者身份的归属会立即决定我们阅读这篇文本的可能方式，也会进而改变我们对孔子或老子的看法。不必说，我们不会把这类无名文本归入孔子或老子名下，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

为人，因此也“知道”他们可能写作怎样的文本。^①

这恰是我们和某些传世文本的问题所在。《庄子》是个好例子：我们相信某些篇章出自庄子手笔，但其他的不是，因为它们不符合我们对作者庄子的看法，以及其他某些章节。在几乎所有其他早期中国文本身上，我们都遭遇到这个问题，原因就是一个事实，即“作者功能”乃是宣称文本统一性、连贯性的最重要方式。对也好，错也好，我们相信像孔子、庄子或其他的作者们可能说某些话，但不可能说另外一些话。就《庄子》而言，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分出内篇、外篇以及作者不一的杂篇[虽然朴仙镜（Esther Klein）2010年发表在《通报》上的文章已经不容置疑地证明西汉所知的《庄子》并非仅由内篇组成^②]。就《论语》而言，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提出文本不同部分来源于不同的弟子，甚至不同辈分的弟子（尽管现有的西汉时期《论语》包括或不包括哪些章节的证据并不能证明这一“层积”模型）。就《荀子》和《韩非子》而言，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提出荀匡和韩非平生必然写作了种种不同的论题。所有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基于一种观念，即一位作者必然代表了一种连贯、统一的观点角度和声音。“作者功能”在反方向上也发挥着功用：因为它，我们绝不可能把孔子认定成某篇无名军事或医学文本的作者。

这一切的意义在于：当我们把某篇早期文献归名于某位作者时，我们其实是在试图限制这篇文本的可能阐释方式，而且我们总是试图把文本融入到我们自以为已知的传统思想史里。当我们宣称某篇无名文本出于传统思想史里有名有姓的作者时，我们是用手里最有力的武器来把传统的读解强加在这篇文本上，并排除下面这种可能性，即这篇文本可能

^① 参见 John Makeham, “A Critical Overview of Some Contemporary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Composition and Date of *Lunyu*,” 普林斯顿大学 “The Analects-A Western Han Text?” 会议论文, 2011年11月4—5日。

^② 见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in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ed. Josué V. Harari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141—160.

^① 而且这还是在现有《史记》已经呈现了较为复杂的孔子形象的情况下，譬如说他任大司寇期间诛鲁大夫少正卯。

^② Esther Klein, “Where there Inner Chapters in the Warring States? A New Examination of Evidence about the *Zhuangzi*,” *T'oung Pao* 96 (2010): 299—369.

不在传统框架之内，或者说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传统的框架了。借此，我们想要接受的只是我们已经相信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方法论问题。

因此在接受这种作者的归属之前，我们应当反问下面几个问题：首先，把文本归诸某位作者意味着什么，对我们阐释此文本的后果又是什么？其次，战国时代中国的作者身份的整体状况如何？再次，战国手抄文献是如何反映作者身份的？最后，从比较的角度来考虑作者身份归属是否有启发意义，譬如把早期中国和古希腊相比较？

只要看看汉代以来的中国文本传统，我们很难想象还有其他哪种文本文化如此关注作者身份，并把阅读文本当作个人性格及其特殊历史环境之显现的了。譬如说，当我们阅读陶潜或者杜甫诗歌的时候，总不免被淹没在传统和现代的注疏里，它们从文本建构出作者的传记，然后再用这些假定的作者传记来重建其所依据的文本——这种循环过程就叫“传记谬误”。自《诗大序》以来，一首诗——几乎任何一首值得一读的的诗——都必须有所根本：其存在的意义在于真实展现了个人对特殊历史环境的反应。简言之，自汉世以降，作者身份的问题对中国文学传统便具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其结果是，我们不免受到巨大的诱惑，想要把对作者身份的注重同样投射到先秦时期：因为一旦习惯了通过作者形象来解读文本，不论这一形象有多少虚构或重构的成分，我们都难以想象另外一种不同的方法。

事实上，与古希腊的比较将表明两种文明都有强烈的把文本等同于作者的倾向。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主要文献——历史、话剧、荷马史诗——都会被归于有名可见的作者。因此我们读到《史记·孔子世家》里类似现象的时候，就毫不觉得奇怪：正如在古希腊有荷马与史诗一样，理想的作者（孔子）匹配上了理想的一系列文本（六艺及其后的五经）。《史记》里，司马迁两次把自己展现成一位读者，对他来说，文本和作者互相指代——第一次是孔子，第二次是屈原：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世家》）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

极不寻常的是，这种情况绝不见于先秦。前帝国时期唯一归于某位作者名下的主要文本就是《春秋》，而且这只出现一次，在《孟子·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在先秦文本文化里，这段话对作者身份的指称是绝无仅有的孤证。这段话可注意者有如下四点：首先，其动词的选择。孔子“作”《春秋》，这表明他僭越了天子之职。孔子所“作”者并不仅是一篇文本，而是一种新的王权模型，并以此取代了迄今为止的王道。作为真正的“作”者，孔子被展现为一位圣人。在先秦，没有其他任何人曾经被指名“作”了一部长篇的文本以供后世阅读。其次，纵有汉之世，把《春秋》归名孔子的也仅此一例，表明孔子“作”《春秋》这事当时并不为人广泛所知，或者不被看成是孔子的一项主要贡献。

再次，《孟子》这段话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孔子声称掌握了其作品的真正所有权，并且愿意为其后果负责。他是福柯意义上的真正作者，甘愿为了他的作品接受惩罚。何况，他的作品也的确后果深远；根据《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最后，孔子被描绘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作者，他响应自己的时代，为后代而著述；他的作品向我们提供了他本人对历史的判断，但更重要的是，作品传达了作者本人的道德立场。事实上，《孟子》里还有另外两段话，强调作者是文本之源，故而

若要理解一篇文本，就不能不考虑到其作者。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惟）〔维〕则。’此之谓也。《书》曰：‘（祗）〔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是为父不得而子也？”（《孟子·万章上》）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当我们阅读早期中国传统的文本时，这些都听起来耳熟能详，因为这些都是自汉代——特别是自《史记》——以来关于作者身份的典型论述。但倘若我们检查先秦的证据，这种情况十分鲜见。文本宣布作者身份或归诸作者名下的情况极为罕见，多数限于《左传》即席所诵的短

歌。^①《荀子》和《韩非子》等战国晚期的文本里有极少几处自我指涉的作者身份概念，但这些段落断代都颇成问题，正如《庄子》末章《天下》一样。然而就算我们把所有这些可能指涉有名有姓作者的篇章都断代到先秦——这种观点是需要谨慎怀疑的——它们也不过几个孤立的例外，而先秦中国文本的整体依然以无名的写作与汇编为常例。^②总言之，我以为早期中国作者身份的概念并非来自哲学或文学文本；相反，它来自《左传》《国语》里的发言人（大臣或谋臣），并从这一点出发，进而形成了书面奏疏（书、上书、表、奏、议等）的作者身份；作为给君王的书面奏疏，作者观念也出现在《韩非子》这样的文本及汉代早期政治话语里。

从这个角度看，古希腊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乃是根本甚至惊人的。当古希腊的文学和哲学之兴起与强烈的作者观念相为表里时，早期中国则在若干世纪里完全无须提及主要文本的作者（也就是说不涉及大臣用口述或书面的方式对君王进言的这些具体情况）；这里，文本的意义和权威不在于具体个人化的文本起源，也不在于其文本全篇的完整性。相反，在一篇文本选择性的召唤和重建的不断演化的瞬间里，意义一次次出现并再现：不断支持它的是我所谓的“传统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tradition）。仅自汉朝起，新文本出现时便自我指涉其作者（例如司马迁或扬雄），旧的文本也被追溯性地归入作者或编者名下（例如孔子、周公、屈原）。

那么早期中国手抄文献又如何呢？迄今为止，还没有哪篇出土的早期中国手抄文献提到自己作者的名字（不同于一些信件或行政文书上书吏偶然的签名）。我们手里有些竹简背后有标题。著名的例子有上博的

^① 我这里不考虑《诗经》里有四首诗（毛 191, 200, 259, 260）卒章提到某位个人所作或所诵。我正在完成一篇研究文章，其中我提出这些卒句都不是歌诗的原有部分。但即便置此不论，这些诗也没有哪篇比得上《孟子》所宣称的孔子作者身份那样强有力。

^②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早已指出了这一点。

《子羔》简和《容成氏》简，或者是清华的《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及《祭公之顾命》等简（《祭公之顾命》的标题出现在第21号简正面）。同一时期的公元前300年左右，我们也看到一些文本指涉了其自身的完整性，例如郭店《缁衣》简做了“廿三”的记号，以此规定并确保其章节的编号。类似的是，上博《缁衣》简有两处后来的添字，表明类似的对文本完整性和准确性的关怀；郭店《缁衣》一处简的背面添入了正面漏刻的文本；清华藏简里也有几处竹简背后有编号。因此，这些抄本的书吏无疑对自己正在刻写的文本之身份和界限有清晰的概念。同时，他们却毫不关心自己文本的出处或作者——哪怕一次都没有！甚至当手抄文献涉及其他文本时，他们也对其作者片字不提；因此，当不同的郭店竹简提到传统经典“六艺”的文本时，谈的都只是其实际或潜在的用处，而非其来源。一篇文本可能融入的我们所谓“传统话语”（traditional discourse）的情况也是一样。不妨考虑一下最早以《孔子诗论》这个容易误解的标题发表，如今经常被称作《诗论》（我以为还是不太准确）的文本。依照李学勤整理的次序，它在开篇云：

《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①

还有同篇文献里另一段不长的话：

《东方未明》有利词。《将仲》之言，不可不畏也。《扬之水》其爱妇烈。《采芣》之爱妇[……]《君子》阳阳小人。《有兔》不逢时。

^① 由于本文目的所限，我不讨论具体的字词，而只提供现代转录的文本。有关此文本及其个别字词段落的不同阐释，优秀的研究包括：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

《大田》之卒章知言而礼。《小明》不[……]忠。《邶柏舟》闷。《鼓风》悲。《蓼莪》有孝志。《隰有萋楚》得而悔之也。^②[……]言恶而不愆。《墙有茨》慎密而不知言。《青蝇》知[……]《卷而》不知人。《涉溱》其绝。《着而》士。《角枕》妇。《河水》知。

这些对个别歌诗的极其简短的评述，尤其是第一简仅用一字的描述，无形中宣称了某种权威。这里提到的是已然确立、达成共识的知识。《诗论》并不讨论；它只罗列出什么是必须知道并且接受的。^③

但字里行间，《诗论》并未暗示其传统资源的来历或者权威，而仅仅宣称自己是一部传统的文本，很可能从属某种特定的家学。它也没有提供自己作者身份的证据。正如对许多其他重要的早期文本一样，不少现代学者对此深感不满；结果，《诗论》研究里最为狂热的浪潮就是追寻其作者。少数几名学者把作者界定为儒家的无名传人就心满意足了；其他人则力推子夏。在论证子夏的作者权时，李学勤等的论断基于两组“证据”：首先，《论语·八佾》（3.8）里孔子曾经简洁地赞赏过子夏对《诗》的心得；其次，所谓子夏传诗有三条简短的记述，来自《汉书》乃至陆德明（556—627）的《经典释文·序》——孔子（或子夏）身后五百乃至一千年之后的数据。（如陈桐生注意到的，资料越晚出，对子夏擅长《诗》学就越言之凿凿——而这些数据里最早的对此几乎不置一词。）仅凭这点证据，邢文便提出：“根据现有的传世资料，子夏很可能就是简书《诗论》的作者。”^③

^① 黄怀信假定阙文后的几个字指的是《相鼠》；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第127—129页。

^② 参见我的“说《诗》：《孔子诗论》之文理与义理”文学遗产2012.3：17—25；及“Speaking of Poetry：Pattern and Argument in the ‘Kongzi shilun’”，in *Literary Forms of Argument in Early China*, ed. Dirk Meyer and Joachim Gentz (Leiden: Brill, 2015), 175—200.

^③ Xing Wen,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39.4 (2008): 6.

不妨从我上文的观察角度来思考一下这条论断。为什么我们对界定无名抄本作者之事如此热衷？把《诗论》定在子夏名下有什么好处？这一归名对我们理解文本是否有任何帮助？此外，我们如今有了《诗论》这篇讨论《诗经》的唯一的先秦文本，这是个偶然事实，并让这篇文本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但这点却不能提高这篇文本在它自身的历史语境里的地位。当时有可能存在（或许的确存在）许多《诗论》一类的文本。因此，倘若下一个发现的手抄本里包括了对《诗》的略有不同的论述，我们将怎么办？——我们是否需要另一位作者，其身份假定必须和子夏有所不同？^①或者说我们可以把不止一件作品归于子夏名下？把《诗论》归名子夏的学者断言说，子夏曾经个人旅行到南方的楚地，而因为他个人的存在和教谕，南方学子得以知道并传习《诗》学。但这何以成为我们想象《诗》在先秦传播与传承的唯一方式呢？为什么早期中国地位最高、最广为人知的文本（即在战国秦汉传世和出土文献里引据最广的资源文本）会如此依赖于某位个人，尽管马王堆、郭店出土、上博和清华所藏的抄本都是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南方有一条深厚的经典传统，融汇《诗》、《书》、礼学及其他丰富的文本和思想资源？子夏传诗于楚的假设难道不是在延续传统的观念，认为经典传习只是北方（特别是山东一带）文化的专利，而“未开化”的“南蛮”必须悉心受教于《诗》吗？——这种北方文化优越性的想象，在过去几十年南方出土或被盗窃的丰富文本及其所承载的深厚物质文明面前，荡然无存。最后，就方法论的严谨而言，我们怎能自以为是地从去年已远的后世传统里拈出短短的几句话，便声称我们有“传世文本证据”来找到《诗论》的作者呢？

面对马王堆这样的大墓，我们看到的是让人眼花缭乱的丰富历史、

^① 这正是黄怀信把《诗论》定名子夏的困难所在，因为他相信子夏是《诗大序》的作者，因此不可能作《诗论》；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页322。此处我也想难苟同；《诗大序》归诸子夏的证据实在是很薄弱的。

哲学、医学、星占等文本，它们彼此之间似不相关。程度不及，但依然令人困惑的是郭店这样的墓葬，里面有原始《老子》残篇、《太一生水》的宇宙发生论、熟悉的《礼记·缙衣》一章，还有一系列短篇，其中不少内容都涉及道德与修身，但却不能清晰定义为“儒家”或“道家”。当我们给它们指派作者时——孔子弟子子夏作《诗论》、其孙子思作其余若干郭店文本等等——我们是想要一石多鸟：我们界定了文本的历史属性；我们建立了它创作的时间和地点，假设它是对当时历史情境的回应，借此定义其意义；我们通过已知或想象中关于其作者为人的一切来阅读这篇文本；我们在早期作品的宇宙里给它规定了一个位置，从此它以某些固定的方式与一些文本相连，而与其他文本则无交涉——因为正如上文提到的，我们假定一位作者的多篇文本必须思想一致。用福柯的话来说，“作者在意义的无限滋生里扮演了经济的原则”，帮助我们解决面对让人眼花缭乱的系列无名抄本时遇到的问题。当我们把郭店和马王堆出土的《五行》篇定为子思作时，我们简化了它们可能的种种阐释，把它们看作代表孔子嫡孙子思的思想；结果《五行》篇就进入了儒家而非道家系统。当然，从这个角度看，子思不可能同时也是原始《老子》的作者。我们把《五行》篇融入一条特殊的话语体系，因此把它与其他体系相割裂；从我们所选择的话语体系出发，我们限制了它可能的各种意义，因此推导出对抄本边界清晰的哲学阐释。这条“经济原则”也体现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和《庄子·天下篇》，并最明显体现在以刘向为主要作者制作的皇家秘阁目录。这里，作者的功能就是给文本宇宙规定秩序的一种指导原则。为了创造一部“作品集”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把它与其他“作品集”区别开，并给它在整体的文本世界里指定一个单一、清楚的位置，没有什么比一个作者人格的存在更有力的了，不论这个作者人格是真实还是虚构。

但幸或不幸的是，我们的手抄文献来自不知有刘向的时代。它们篇幅短小，彼此无关，因此几乎不可能判断出它们在早期文本性的地图

上占据的精确坐标。它们以无数或多或少的方式与其他文本交迭，挫败我们追寻统一性、连贯性和差异性的努力。它们以不断变换的组合出现或再现——在马王堆，我们有两篇《老子》全本，但在郭店却只有原始《老子》的残篇，其物理外形与《太一生水》的宇宙发生论毫无二致。它们从不关心自己的作者或出处。当我们今天作为学者想尽办法界定其作者或出处时，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早期中国的这种局面；但之后，就方法论而言，我们也必须理解当我们阅读这些文本时，假定的“作者”实现了那些功能。^①

四、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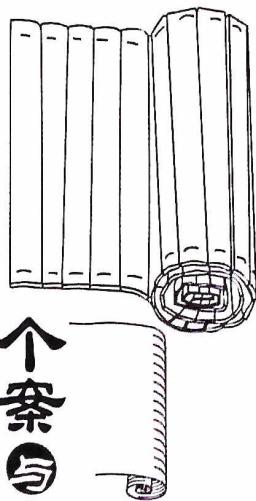
刚才提出的五个论题仅仅是我相信早期中国文献研究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观点角度的若干例证。有趣的是，某些论题曾一度在古代中国研究领域里占据过更加显要的地位，例见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余嘉锡的《古书通例》。（近年唯一例外的，是李零的力作《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此书于当今中国学术界很少被人引用。）遗憾的是，随着当下对新出土文献的兴奋，随着“国学”框架的建立和对顾颉刚及其“疑古派”的摒弃，这些学者的洞见多少被沉埋湮没了。事实上，上面提出的问题无关“信古”或“疑古”；它们是由基本的理论考虑而引起，关注的是如何发展出更有系统的、方法论的进路，以用于处理古代文本。这类关怀

^① 我已经就早期中国文献的作者身份问题，分别于三项研究中进一步撰写了三篇文章：“The ‘Masters’ in the Shiji,” *T’oung Pao* 101.4—5 (2015): 335—362；“Kongzi as Author in the Han,” in *The Analects Revisit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Dating of a Classic*, ed. Michael Hunter, Martin Kern, and Oliver Weingarten (Leiden: Brill, forthcoming)；及“Shiji li de ‘zuozhe’ gainian”《〈史记〉里的“作者”概念》，载于《史记学与世界汉学续编》ed. Lee Chi-hsiang 李纪祥 and Martin Kern (唐山书店, 2016)。

并非新事，也不会导致对研究对象的漠视；其实长期以来，它们已经置身于任何对古代文明的研究的核心，因为它们允许全世界的学者更清楚地理解这些文明。因此，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方法极少被应用于我们目前对中国古代文本的分析中，尤其是在章学诚和余嘉锡这样的大家早已指出正确进路之后。就长远而言，我难以想象，我们今天如何不凭借基本的方法论概念而能够取得成功。在我们看来，这些概念早已是我们理解古代整体文明的必需工具。



敦煌書院 國學文庫
主編◎朱漢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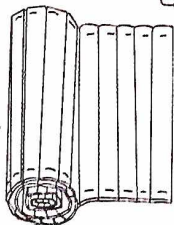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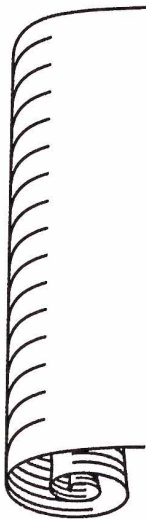


簡帛思想文獻研究

JIANBO SIXIANG WENXIAN YANJIU

個案與方法

刘笑敢 郑吉雄 梁涛◎编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帛思想文献研究：个案与方法 / 刘笑敢，郑吉雄，
梁涛编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3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

ISBN 978-7-5207-0751-0

I. ①简… II. ①刘… ②郑… ③梁… III. ①思想史
—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B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9104号

简帛思想文献研究：个案与方法

(JIANBO SIXIANG WENXIAN YANJIU: GE'AN YU FANGFA)

编 者：刘笑敢 郑吉雄 梁 涛

责任编辑：辛春来 来芙蓉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政编码：100007

印 刷：天津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9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36

字 数：50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0751-0

定 价：79.00元

发行电话：(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010) 85924602 85924603